

沉重的回望

□玄子

近一周,两本厚实的图书占据了我的桌面,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: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》。主编是赵省伟。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他主编了“西洋镜”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”系列丛书。如书名展示,这是一册册厚重的西方媒体对中国19~20世纪历史变迁的记录,更是以他们的视角、以他们的认知记录下来的那段繁复、无法定论的历史。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记录的是一段过往,一段于一个甲子前与中国息息相关、却为时人所忽略的过往;这是一条条脉络,一条条充溢着西方审美认知、交织着东方麻木神经的脉络,绵亘而成一场发生在东北时称满洲的土地上的一场战争。

日俄战争是1904~1905年间在中国东北、朝鲜半岛、黄海地区和对马海峡之间发动的一场历时较长、人员伤亡惨重的战争,它是东北亚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事件,这场战争动摇了沙皇的统治,日本则从此跨入了列强的行列,韩国与中国也迎来各自历史发展或明或暗的转折点。日俄战争的触发源于“甲午战争”,1895年4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条约除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外,还要求清政府向日本割地赔款以及同意日本享受其他特权。特别是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,激怒了俄罗斯,于是三国干涉还辽、迫使日本修改《马关条约》的事件。日俄在远东的利害冲突日益白热化。1902年,英国和日本为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利益,反对俄国在远东扩张结成了互助同盟,同年,作为应对方案,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宣言,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,为保护两国之利益,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。1904年2月5日,日方决定同俄国断交,同时,日本天皇即指示开始军事行动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,于2月6日0时传达天皇的决定,下令日本舰队开赴黄海,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(济物浦)的俄舰。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攫取的仅有的不冻港,由于气候条件带来的优越性,让它大热,当时是太平洋分舰队的主要基地。整个日俄战争期间,始终贯穿穿着双方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,实质上是争夺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海权。而每年12月至来年4月进入结冻期的海参崴遭冷遇归于岑寂。

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: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》取材于英国《图片报》、法国《小日报》《小巴黎人报》、意大利《周日邮报》《周日论坛画报》等。共收录500幅画报,500幅版画,19万字。这些甚至在中国权威收藏机构都未曾一见的版画,不仅填补了日俄战争在出版领域的空白,而且给了我们新的视角审视这段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历史。1904年1月2日英国《图片报》刊发的新闻《在满洲进行“野外训练”的俄军》开篇,其时以慈禧太后为实际掌权者的清朝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反应,甚至他们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这场非正义战争是漠视的。1904年2月6日,《图片报》刊发了《新的创举:慈禧太后请西洋画师画像》的新闻,新闻中有这样的文字描述,“这在清朝这样的东方大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”。然而在日俄战争初始阶段出现这样的“创举”,实在不是件让国人真得分的事情。在美国画师卡尔笔下,叼着烟卷的慈禧太后,右臂驾在扶手,带了指甲套的手无力垂下,显得人物呆板、僵硬,这张画像一式三幅,其中一幅交给清朝的外务部,另一幅则远渡重洋,寄往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。同为肖像画,在《现代日本的两位缔造者》中,并排而坐的伊藤博文和山具有朋的形象,作为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两位日本将领,他们笃定淡然,更多地显露出他们的运筹帷幄,确切地说是精于算计。至于屡屡出现于书中的本周热点、战争日志、某军事要塞及海战场景鸟瞰图、战争示意图与各种攻防设施的呈现,一而再地向读者昭示着20世纪发生在中国与朝鲜的那场战争的非正义与穷凶极恶。

今天,我们有幸通过这些沉淀了一百余年的欧洲新闻史料对日俄战争,对曾经的中国回望、思考,这便是极为珍贵的价值了吧!

255

我写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,颇有人不满意其体裁,以为比拟不伦,也拘泥于形式。其实在我看来,此种论调反而是太拘泥于形式,不能超脱于形式来判断内容,岂不闻九方皋相马乎?

好像还有人质疑:难道现代中国学术史值得表彰的人物,就刚好是一百零九个吗?这不是为了迁就形式而扭曲内容吗?

我想,可以这么回应:试问,七绝为什么非得二十八个字,七律为什么非得五十六个字呢?西洋没有中式格律诗,但也有十四行诗——为什么非得写成十四行呢,难道诗人的灵感就刚好能写成十四行吗?况且,古人填词

度固然是迁就格律的,但今人写歌,或依曲填词、或按词谱曲,不也得迁就既有的形式吗?没有八股文,或许无关紧要,但能想象没有格律诗、没有词和曲的中国古典文学吗?可以说,没有格律、没有对形式的拘泥,也就没有古代文学史了。

西洋美学家有所谓“有意味的形式”之说,我觉得,诗的格律就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,点将录也属于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我不是为自己的著作辩护,我是为一切“有意味的形式”辩护。很多时候,创作就得遵守有形或无形的“游戏规则”,用闻一多的话说就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很多时候,内容的精彩,其实是被形式逼出来的。

256

反读书记(九十二)
□胡文辉

传统的历史编纂,多以大人物为中心,有时不很公平,但又事出有因。

大人物在品格上,甚至在才能上,当然未必杰出,往往不过适逢其会而已。可是,既然他们占据了历史的重心地位,好也罢、坏也罢,总要比一般人更能影响历史的走势,也更能体现历史的走势,这也不能否认。大人物作为个人未必重要,但其扮演的角色却往往是重要的。

由于后现代思潮所及,高端的史学界有一股反传统的风气,即轻视主流、轻视上层、轻视大人物,而重视非主流、重视底层、重视小人物。这是对传统历史编纂的修正,确有一点纠偏的意义,但却不能因此取消传统的历史编纂。对于大人物,需要多一些批判,但不能全盘抹杀。没有大人物的话,历史就是一盘散沙、一地鸡毛了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〇

新书快递
勘破狐狸窗:
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

吴真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狐狸窗,是日本民间至今流传的一种手诀。当人类遭遇狐狸嫁女、妖怪作魅等怪异现象时,赶紧用八根手指头搭成一个菱形的狐狸窗,置于眼前。透过狐狸窗你就能看见,那些粼粼点点的鬼火,其实是朝圣的狐狸们拿着提灯,列队前往狐狸王国的首都——东京王子稻荷神社。作者十年来,多次往返中国、日本,实地考察、调研日本民俗,做自己喜欢的研究,并且寻访珍本善书。作者分梳了“人事”与“书事”两个范畴,在细密寻访中,将它们各自奇妙的经历与发现呈现给读者。

冬青老人口述

卞孝萱口述 赵益整理
凤凰出版社

此书稿为卞孝萱先生晚年的口述稿,由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在口述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。并从卞先生历年所撰文章中,选择颇能与口述内容相表里的若干篇目,作为附录,书内并附卞先生的书画、题识、手札收藏作为口述的印证。书稿力求发掘卞先生所深悉的晚清民国遗老行迹、近现代学术等方面口述史料。

“山中”的六朝史

魏斌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在六朝江南社会,“山中”这一地理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、道教洞天体系和山中修道的官观化,一些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,江南山岳完成“名山化”的过程,文化景观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地理格局。作者立足山岳,全面搜集正史以外的宗教文献、文学作品、石刻史料等,打通佛道二教,透过若干个案的“深描”,细腻地展现了山岳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,佛道与民间信仰在山岳中活动的复杂关系。

萨基短篇小说选(插图珍藏本)

[英]萨基著 冯涛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收集了英国最出色的讽刺短篇小说家萨基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均从其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中选收而成。他的作品结构严谨,构思巧妙,文风机智、俏皮,用笔辛辣、奇特,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生活,反映了上层社会的种种陈腐庸俗与愚蠢浅陋,无情讽刺了现实的政治状况,并且常以异峰突起式的意外结局点明主题。文笔不俗、故事有趣,是当之无愧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品。

灯下读钱

钱锺书“对我真是
当知心朋友
看待的”
□钱之俊

2007年,李怀宇先生赴美,其间访问了余英时、唐德刚、夏志清等十二位学人,“在平易近人的笑谈中,倾听他们畅谈人生与创作生涯,并借由他们的亲身经历,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、雅事趣谈,细数一页页风卷残云的往事。”(见李怀宇《家国万里:访问旅美十二学人》封底页,中华书局2013年第1版)在评点过往人物中,钱锺书是其中重要一位,受访者都会或多或少谈及。

夏志清和钱锺书的关系,想必看过《追念钱锺书先生》《重会钱锺书纪实》《钱氏未完稿〈百合心〉遗落何方?》等几篇有名文章,以及夏氏去世后被公开的二人之间书信的人,肯定不会陌生,此处不再复述。钱锺书仅凭一部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和几篇短篇小说,就被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独立列章、推崇备至,其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大家的预期。这次采访,李怀宇问到《围城》在1940年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,夏志清说:“《围城》初在《文艺复兴》上连载的时候,读者一定很多。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,上面要打钱锺书,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《围城》,上海当然更多,当年骂钱锺书、骂沈从文,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。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。”(第97页)骂钱锺书者有,但并不如夏志清想象得那么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谣传钱锺书去世,夏志清深情撰文追念钱锺书,此时,他已经好几十年未见过钱锺书了。李怀宇问他后来见到真人和看他的文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他回答:“他对我很好,很感激我,他是在意大利看见我那本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的,一看到,就大为感动。本来内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学,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,上面有意要打击他,他的小说就没人看了。后来大捧他是我的书发行以后。钱锺书就是写信太捧人了,客气得一塌糊涂。钱锺书待人过分客气,但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。”(第98页)钱锺书究竟是怎么捧夏志清的呢?“尊著早拜读,文笔之雅、识力之定,迥异点鬼簿、户口册之伦,足以开拓心胸、澡雪精神,不特名世,亦必传世。……”(1979年4月13日函)呵呵,夏志清心里还是清楚的。

钱锺书同时代“好朋友”并不多,夏志清、宋淇等可算几个吧。夏志清在受访中说到宋淇时说:“宋淇好人一个,我的事宋淇都帮忙,钱锺书、张爱玲都是他的好朋友。”(第97页)上海孤岛时期,钱锺书、宋淇和夏志清他们曾在一起“玩过”:“钱锺书定居上海后,宋淇即同他交识。那时宋淇以鲍威James Boswell自居,待钱如约翰生博士,钱是非常健谈的人,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,当然非常欢迎。有一次,想是1944年秋季,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‘派对’,把我也请去了。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,好像是苏东坡《赤壁怀古》中的周公瑾,的确风流倜傥、雄姿英发,虽然他穿的是西装,也戴了眼镜。”(夏志清《追念钱锺书先生》)乱世之中,那时大家都是壮志未酬的青年人,谁也不会料到,几年后,会各自分离,远隔千山万水,遥遥不能相聚……